

王阳明建构信仰共同体的尝试

吕诗尧^①

内容提要：王阳明良知学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挽救世道人心。他认为琐碎支离和虚妄颓靡是当时需要坚决抵制的两大士风。在理论上，王阳明批评、反思朱子学和佛氏，建立起正心、诚意的良知学以抵制这两种士风。为解决明前期士人的精神危机以及他们关于人生价值的困惑，是一种道德理想。

关键词：王阳明 良知学 士风

作者简介：吕诗尧，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

王阳明的良知学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它的研究也已经存在多种视野的解读，包括思想史、概念史、现象学等角度的解读等。笔者以明代政治和历史为具体语境，理解王阳明的良知学和他对朱熹的鄙薄，甚至切齿。在此基础上，试图另辟诠释良知学的蹊径。

一、良知学理解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是为解决明前期士人的精神危机以及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困惑的一种道德理想。同时，良知又是他的心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这两方面都与孟子的良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人认为王阳明的学问是孟子学；学术界则经常把陆王心学放在一起，来作为一种对学术继承关系的考察；也有人认为他是宋明道学内部的区别于理学的不同派别，如此云云。作为对王阳明学问之来源的考量，只要言之成理，大可以各持己见，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界定王阳明的学问，却关联着他如何为时代病症进行把脉这一问题。因为，王阳明的学问虽然渗透进了强烈的浪漫感性，但是，他学问根本着眼点却在于政治。而政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士风决定的。在方孝孺以社会责任为行道方式的实践遇到政治的打击而不能延续后，王阳明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拯救被政治打击后的萎弱士风，即在黑暗的政治环境和现实环境里，如何提振起“我”的那个真精神。王阳明心学作为广义的理学，和朱熹一样，也是以成圣作为第一等德业的。但是，王阳明似乎更关注圣贤倘若再世，如何能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现实问题。很显然，他认为朱熹的成圣的进路是不对的。因为，朱熹钻到故纸堆的寻道方法并不能真正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所谓未得，谓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同时，他的个人经历和对世道人心的现实感受似乎正也证明了，朱熹的格物、诚意之法并不能实现王阳明想实现的目的，即通过拯救士人来拯救政治，恢复三代圣贤之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在挑起对世道的担当和一番生死考验后，他终于悟到了能使心中之理与外物之理融而为一的圣贤之道，即良知。他领悟了颜回“四勿之训”以及在当代的深意。他自己曾经说，“自颜子歿而圣学亡矣。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心之生理，即谓之仁，谓之性；性之虚明灵觉，即谓之良知。”^① 孟子的“良知”被王阳明所用，借以表达悟到的拯救世道之法。而他悟到的心学就实际的功夫来说注重静坐，顿悟。高明的人喜静厌动，有流于不注重积累的祸患；而对于资质卑下的人来说，则有难以悟道，不能入门的弊端。因此，为了使道德践履的功夫有实实在在的下手处，王阳明才揭发出了明德亲民、诚意格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实际功夫，以使学者有实下手处。而心、性、理等概念则均是被王阳明引用以兹表达自我和落实功夫的时代话语。通过这一套理学话语，就能摸清楚王阳明对时代弊病开出什么样的药方。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2页。



二、两种颓弊士风

王阳明有见于挽救琐碎支离和虚妄颓靡的士风，所以，在理论上，他便拿朱子学和佛氏开刀。作为理论上的表现，二者都没有处理好诚意和格物、明德和亲民之间的关系。作为现实当中存在的士风，流于虚妄的士人和陷溺于富贵名利场的人都没有达到至善的境界，其原因就在于对《大学》的理解有偏差，也正是这种偏差导致了朱子和佛家偏离了圣贤之道。

首先说琐碎、支离者。当时的庸俗之儒死守朱子学，向册子上的死理用功。于是，所学的册子上的知识越多，在遇到利欲的诱惑时，就有可能不能诚意、正心，守不住仁、义、礼、智、信；越有才华越努力，自己对圣贤之道的领悟和思考反而越少。“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①“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②可见，修身的要点首先就在于诚意。朱熹和王阳明在求道目的上是一样的，即都是要修成圣贤。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成圣方式大不相同。朱熹强调在《六经》当中去学习，以求事物之理作为功夫。王阳明的致良知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道德践履功夫，但更强调在事物上认识、体会那个心中之天理，也即良知。类似于孔子的“克己”，颜渊“四勿之训”的功夫，孟子的“存心、养性”，“存心养性之外，无别学。”^③

立志就是要立志作圣，而栽培之功即体现出阳明心学和朱学用功方向的不同。王阳明强调初学者必须省察克治，省察克治是为了诚意，然后获得事物的道理。先生曰：“初学者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使‘何思何虑’矣。”^④

可见，王阳明为学成圣的功夫是向心体上用功，也即道德的修养，就像颜回的“四勿之训”。有的人怀疑向心体用功和知识获得之间的联系，“看书不能明如何？”王阳明回答，“须从心体上用功。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⑤只要省察克己以保持性体的澄明，然后再对照《六经》和事物，来验证性体澄明后的心中之理，就能获得知识。王阳明之所以发明出相反于朱子学的用功方法，是着眼于由此而造成的支离琐碎的士风。但是，作为拯救时弊的办法，诚意的日用功夫特别重要，“修身惟在于诚意，故特揭诚意以示人修身之要。诚意只是慎独，工夫只在格物上用，犹中庸之‘戒惧’也。”^⑥所以，有的人就因王阳明重视诚意而质疑格物的一段功夫。“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入门之际，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⑦

王阳明提出，诚意必须在格物上用，所谓“必有事焉”。他说：

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③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

④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⑤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页。

⑦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页。

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①

可见，诚意是要保持性体的澄明。格物是在“必有事焉”上回头体验性体澄明时心中的那个事上之理。要认识事上之理，就不能脱离自己的性体；而保持自己性体的澄明，就不能脱离事，二者是统一的。孟子曾经否认在外物上求个义，而强调在从内心用力，但是，只强调了内在的一面，忽略了必须在事上验证心中的那个义。正如王阳明所说：“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乃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与？不可不察也。”^②

而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③ 王阳明在与罗钦顺的书信中谈到恢复大学古本目的就是为了矫正朱熹对大学解释的偏离。

其次说虚妄颓靡者。修身不本于诚意，而去求取官禄，就有流于支离琐碎的弊病。而只讲究意诚或明明德，鄙视世俗的士人，又会流于虚妄颓靡。前者是由朱子学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而造成颓靡空虚士风的理论原因就是佛氏。佛氏虽然不同于朱子学的向外用功，和王阳明一样都主张向内用功，但却忽略了须向外进行一番事上磨练的功夫。站在理论的角度，佛氏之徒没能处理好格物和诚意、明明德和亲民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忽略了格物或亲民的环节。他说：“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④

明明德和亲民之间是为学和为政的关系。佛氏之过就在于忽略了亲民的一端，而失于虚罔空寂。王阳明说：“昔之人固有欲明明德矣，然获失之虚罔空寂，而无有乎家国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于亲民，而二氏之流是矣。”^⑤

使人的明德明了，应该通过孝、弟、忠、信的行为去发现自己的明德。与格物和诚意的关系一样，都是讲知行合一，达到至善的境界。什么是孝、弟、忠、信的礼法，只有切实地去行孝亲、忠君的行为，才是孝的礼法。要明明德必须要亲民，只有亲民，才是使明德昭明。亲民达到至善的境界，不但一己之身得到了修炼，而且可以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政治理想。倘若人人都能自明其明德，那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也就不难了。朱子学之所以不能拯救世道，不能拯救人心，就在于割裂了明明德和亲民、诚意和格物之间的联系，遂使明德亲民之学大乱于天下。

而关于儒和佛的关系，则被王阳明一语道破。只有将格物和诚意、明明德和亲民完美地结合，才能达到最高的圣贤境界。有人问：“如何谓之仙？”王阳明说：“非儒之至者不足以称真仙。”那人又问：“如何谓之儒？”王阳明又说：“非仙之至者不足以言真儒。”^⑥

只要在明德亲民、格物诚心的功夫上实实在在的下功，就能让自己的明德的本体呈现出来，这个明德就是粹然的性，也就是仁，性的虚明灵觉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做圣的功夫，这才是圣贤之学，圣贤之道。“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⑦

三、良知挽救士风、拯救世道

王阳明就以良知来拯救支离琐碎和虚妄的士风。“良知”这一概念，在孟子那里是指人先天具有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2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2页。

③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④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1页。

⑤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67页。

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7页。

⑦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7页。



的道德意识。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是非之心，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①

王阳明的“良知”也具有先天道德意识的义涵，人人天生都具有此是非之心，只是人的良知总是被现实环境蒙蔽住了，所以颠倒了是非善恶之心。他说：“盖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己未尝实致其知，而谓昔人致知之说未有尽。‘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也？但不能致之耳。”^②

但是，孟子的“良知”的道德意识意指亲亲，尊尊的具体道德践履。朱熹修养功夫的琐碎就是没有张扬出孟子对“良知”的重视。导致孟子良知学说晦暗不明。也因此，致使士人假借仁义道德而行一些满足一己之私的勾当，阿谀奉承，混入流俗，遮掩别人的善行，等等。致使社会风气变得更坏，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王阳明张扬出孟子的良知，强调是非善恶作为道德评价原则的重要性，引导社会和人们重塑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僕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知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③

不仅如此，王阳明的“良知”具有更加广泛的义涵。即从是非善恶的价值观扩展为事事物物之理的世界观层面。致良知也便具有更加广泛的涵义，既在事事物物上验证心中粹然无杂的天理，也即致良知；同时又在性体之粹然无杂时，体会事事物物之道理，即格物。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通过致良知的功夫，粹然无杂的天理在自我的本心呈现出来，天理是普遍性的，因此，此良知就是人人都具有的，不因个人的贤愚夭折而有差别。因此，在理论上，人人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④

良知的功夫简便易行，只要在事上磨砺，向内心用功，就能使性体澄明，是非善恶的标准，就自然呈现出来了。明初世道人心的变化以及朱子学不能拯救世道人心的弊病，正是由于良知之学的不明。

现实生活中如何用致良知的功夫，改变自己，改变风俗，拯救世道。实际功夫用孔子的话说叫“克己复礼”，用朱熹的话说叫“存天理，灭人欲”。但是，含义却不同，用功的方向也不同。朱熹主张的功夫，是格物前的道德自律或者准备，而王阳明主张的致良知功夫，必须体现在事情上。王阳明说：“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诸君每相见时，幸默以此意相规切之，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康济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负如此圣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⑤ 体现在琴瑟简编、版筑渔盐各种事情上，“古人琴瑟简编莫非是学，版筑渔盐莫非作圣之地。且如歌诗一事，一歌之间直到圣人地位。若不解良知上用功纵歌得尽如法度，亦只是歌工之悦人耳。若是良知在此歌，真是瞬息之间邪秽荡涤、渣滓消融，直与太虚同体，方是自谦之学。”^⑥ 尤其体现在亲民的政治实践中，事情越繁琐，功夫越重要。“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化，弛然日就于颓废者。”^⑦

能正确地理解致良知，切实的践行致良知，才算把握住了真正的圣贤之道。否则就会沦为离经叛道者。“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直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

① 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7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③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页。

④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98页。

⑤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页。

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2页。

⑦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谓之知道；得此者，方谓之有德。异此而学，即谓之异端；离此而说，即谓之邪说；迷此而行，即谓之冥行。”^①“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②

王阳明坚定地认为心学能救助时弊，但是，朱子学是当时不可挑战的权威，所以他的学问当时遭到世人的非议。朱熹晚年也发现了自己学说有落入支离琐碎的流弊。王阳明抓住这一点，四十七岁，做朱子晚年定论^③，以平定纷争，使圣贤之学更明了。

知行合一也被王阳明揭示出来，为方便人们切实地落实致良知的功夫。王阳明认为，知和行的功夫不分先后，而是同时进行的，格事事物物是行，验证心中之理是知。朱熹向外求道、格事事物物，不免落入知行两分的尴尬境地。

“《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④朱熹知行两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只向书本上用功，也就是使士风流于琐碎支离的原因。“‘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学者不能著体履，而又牵制缠绕于言语之间，愈失而愈远矣。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⑤

王阳明知行合一具体体现在动静合一的功夫中。“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以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决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⑥也体现在平时从政的经历中。有一署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烦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⑦

四、结论

在明代，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界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们的心里情况却并不如此。参加举子业的学生，可能厌恶朱子学的繁琐枯燥，但却不得不把它作为敲开科举考试的敲门砖；没溺于富贵名利场的人，可能利用朱子学附庸风雅，更可能在心里厌恶朱子学的修身功夫不合时宜；道学之士坚守朱子学的修身原则，却在变化了的世道中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动摇；狂放之士梦想朱子学能够重新承担起拯救世道人心的重任，却以狂放的行为嘲弄异化了了的圣贤之道。即便人们在心底如何歇斯底里，朱子学也是士人乃至百姓安身立命的圣贤之道。因为有了理想的人格标准，人性的缺点就会被肆意地被发挥出来。王阳明认为，政治从根本上决定了士风，决定了世道人心。因此，要想拯救世道人心，在当时不可能是佛教，也不可能是朱子学，而只能是良知学。

（责任编辑 王皓月）

①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②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③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2页。
④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⑤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页。
⑥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⑦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页。

